

爲了中國的文化建設

陈方子

在本世紀，中國人心裏曾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，可是，暴風雨中它並不能持久，一次又一次晃動、閃爍，終告熄滅。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時候是這樣，到了今天，在改革開放運動已經推行十年之後，也還是這樣。中國，有這樣悠久文化傳統，這樣優秀人才和龐大潛力的中國，又再一趟遭到挫折，陷入危機之中了。

爲甚麼會這樣？爲甚麼中國總是在改革和停頓之間游移，不能邁步前進？一年多以來，這些問題困擾着許多同事、朋友和我自己，縈迴腦際，揮之不去。我們晨昏議論，反覆爭辯，摸索出路，同時，像多少前輩知識分子一樣，真正感到了作爲中國人的焦慮與沉重心情。

在我們看來，近百年間，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波折重重，其中原因固然很多，有關於本質和主觀意志的，也有取決於機緣或客觀條件的，不一而足。但總的來說，建立新文化的決心和努力不足，恐怕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。不錯，近代中國曾多次出現新思想的萌芽，但是，在迫切的現實政治目標籠罩下，它們或喪失了自主性，或缺乏灌溉和培育，無從發榮、滋長，更談不到成爲覆蓋神州大地的濃蔭。現代化是一個長期和根本的蛻變過程，只有在社會已經滲透了新的觀念、意識、思想、行爲模式之後，它才有可能穩定和持續地進行。在這之前，戲劇性的突破固然令人振奮、鼓舞，但那不過是子夜的燭火而已，倘若因而誤以爲長夜已盡，晨曦即將來臨，自然是不免一再感到失望的。

所以，中國今日的問題雖然千頭萬緒，有極其迫切，極其實際的一面，但是深入的，整體的長期文化建設，仍然是知識分子的基本和重要責任。

我們這樣說，絕對不是忽視科技、管理、醫學等專業知識，和工業、交通、運輸、城市建設等等物質條件，更不是認爲，現代化可以憑藉抽象觀念來實現。然而，把現代化的努力局限於實用的層次，以現代化的具體表徵——彩色電視、噴射機、火箭等等——來代替它的思想、觀念，那恐怕也是錯誤的。這不單單因爲現代社會的制度有賴於許多深入人心的抽象觀念——自由、平等、人權、契約、民主、法制等等——，更因爲所謂「現代」，從下層的技術、產品，以至上層的知識、經濟結構、社會動

力，都是不斷地急劇變化的。對今日的中國來說，不但有關社會制度的種種外來思想有待闡揚，而且，經常接受新事物，經常適應和促進變化的心態、能力，也急需培養。否則，從先進國家移植過來的知識、技術，轉瞬就會落伍，甚或當前就會受到原有社會結構的抵制、排斥，不能充分發展。

明治維新年間，日本能夠在貧乏的物質條件下，徹底改革政治社會結構，一躍而為東亞霸主，那和它領導層向西方學習的強烈意識，以及堅決的革新精神，是分不開的。十月革命之後，蘇聯一心一意科學、技術、工業等現實領域追求發展，不遺餘力，並且獲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績。然而，它最近終於醒覺了：固定不變的體制表面上帶來穩定，但從長遠說，其實是扼殺進步的，因此，必須不避國家分裂、失控的危險，要毅然提倡新思維，推行全面體制改革。這兩個近鄰的經驗，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反省的。

這就是我們認為，必須等到傳統思想模式轉化成新觀念、新心態之後，現代化才能夠穩定和持續地在中國進行的緣故；這也就是我們強調文化建設的緣故。

當然，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前途尚有待確定的商業都會而已。免不了有人奇怪，我們究竟憑甚麼，來倡言推動建立新的中國文化。其實，我們所抱着的，只有兩個簡單的信念：第一，在現代，一個民族的進步，最終是要通過智能的發揮和思想的醞釀、激盪，也就是說，是要倚靠知識分子的；第二，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力量，已經分散到全球各地了。從傳播訊息，掌握動態，交流意見的角度來看，四通八達，五方雜處，不拘一格的香港，是具有獨特而無可取代的地位的。

在這兩個信念驅動下，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的構想大半年前逐漸形成了：未來的世紀將是一個多元的世紀，我們希望這份刊物也具有多元性格，成為同時面對全球各地讀者和作者，同時屬於各種不同專業，不同意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刊物；我們希望它對中國思潮的醞釀和發展能起些微作用，但決不希望它只用一個聲音呼喊，只依循一個方向前進。它所扮演的角色應當類似一所茶館、一個咖啡座，而不是一間教室、一座演講廳。

這種想法，曾陸陸續續的，先後和中國文化研究所以及大學裏面的同事討論過，五、六月間又到海外跑了一趟，見到不少熟悉的，以及初次相識的朋友。他們的熱烈反應和鼓勵，堅定了我們的看法，使我們深深相信，今日已經遍布全球的中國知識分子，是願意，也能夠，為建設一種多元的，有前瞻性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而努力的。懷着這樣的信念和希望，我們謹將這本刊物貢獻給中國的將來。

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